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伊斯兰国”加速东扩致南亚东南亚安全形势趋紧

□ 郑　彬

5月29日，在第十四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主旨发言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确指出，当前，“伊斯兰国”向包括东南亚在内亚洲其他国家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强，上述地区正在成为“伊斯兰国”外籍“圣战者”的重要输出国。这使国际社会突然意识到，当全球目光仍聚焦在叙利亚、伊拉克局势上时，“伊斯兰国”已逐渐加快了其东扩的步伐，悄悄将把南亚、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版图范围内，作为新的扩张目标。“伊斯兰国”向南亚等地区的渗透，既具有表层的象征意义，又有着深层的战略考量，并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深远影响。

“伊斯兰国”“恶之花”欲扎根南亚、东南亚

自2014年6月宣布“建国”以来，“伊斯兰国”就从地理概念上将南亚、东南亚划入其“帝国”范围之内，但在其扩张序列上，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相比，南亚等地的战略重要性并不突出。然而，进入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明显加大了向东的势头，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也出现显著提升：1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呼罗珊省”，囊括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内的南亚主要国家，并成立“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组织，任命哈菲兹·赛义德为地区负责人，正式从行政概念上表明对南亚地区拥有“管辖权”；4月，阿富汗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发生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宣布负责，成为该组织首次在南亚地区“认领”的恐怖袭击；同月，马来西亚警方成功挫败一起针对东盟峰会的恐怖袭击，抓获12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恐怖嫌疑人。此外，有消息称，在东南亚“建省”的问题也已被“伊斯兰国”提上日程。

近期“伊斯兰国”开始重视并加大向东渗透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强化其作为全球穆斯林最高领导者的形象。“伊斯兰国”“建国”以来，即宣称自身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拥有权威地位，并将建立“全球性哈里发国”作为最高纲领。而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南亚、东南亚穆斯林人口接近10亿，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60%以上。因此，宣布对这一地区拥有“管辖权”，对塑造和提升“伊斯兰国”影响力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二是力求缓解其在叙、伊主战场所面临的压力。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伊斯兰国”在叙、伊等核心地区所遭受的压力日增，特别是3月底以来，其在伊拉克的生存空间和控制范围遭到挤压。因此，“伊斯兰国”希望借东扩之机，转移国际社会视线，从而缓解其在正面战场的压力。三是寻求兵源和财政收入新的补给。近期，“伊斯兰国”在正面战场兵员战损严重，财政收入来源被削弱，而据叙利亚人权观察者组织统计，作为“伊斯兰国”传统兵源地的中东和欧洲，由于受到各自国家管控加强等因素影响，赴叙、伊参战人数已出现大幅下滑。因此，打通南亚、东南亚连接叙、伊的通道，建立招募网络，对“伊斯兰国”吸引新的外籍“圣战者”具有重要意义。

“伊斯兰国”东扩尚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伊斯兰国”已加大了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渗透力度，但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渗透重点地区相比，其在南亚等国的发展仍属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以招募外籍“圣战者”人数为例，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目前活跃在叙、伊境内的外籍“圣战者”人数大约在15000人左右，其中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圣战者”不足10%，其从属地位明显。目前，制约“伊斯兰国”在该地区发展的原因除其自身“东扩”策略起步较晚外，还包括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从伊斯兰教法学派角度来说，“伊斯兰国”信奉的萨拉菲主义属于罕百里学派，而南亚地区则主要以哈乃斐学派为主，东南亚则属于沙斐仪派。教法学派的不同使“伊斯兰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渗透缺乏类似中东地区一样的广泛宗教基础。另一方面，南亚等地原生武装力量对“伊斯兰国”东扩持警惕态度。南亚等国特别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传统上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势力范围，推崇毛拉·奥马尔为伊斯兰世界哈里发，而不承认巴格达迪的“正统”地位。此外，“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争抢兵源、敛聚财物等做法也侵犯了塔利班等组织的核心利益，导致双方摩擦不断升级，并最终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来看，上述两大因素中，后者对“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更为关键，如能处理好同当地主流武装组织的关系，未来“伊斯兰国”东扩仍具较大潜力。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南亚、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有较强的“圣战”传统。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吸引了来自南亚、东南亚大批的外籍“圣战者”，并在战争结束后将“圣战”思维带回本国。目前活跃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组织、“虔诚军”“简戈维军”以及印尼和菲律宾境内的“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等，都是“圣战”的产物。其次，这一地区伊斯兰极端思想盛行，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发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在70年代末期出现向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南亚、东南亚则成为这一宗教思想重要接受国。以巴基斯坦为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沙特等国宗教输出影响，其境内的宗教学校总数一度超过20000所，其中很多具有极端主义倾向，成为塔利班等组织崛起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上述地区的极端思想和原教旨主义仍有较强的影响，这为“伊斯兰国”等新一代恐怖组织的扎根创造了条件。再次，“伊斯兰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官僚机构、教育公共卫生系统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区实行国家化管理，这与其他恐怖组织相比，算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因此对全球“圣战者”形成了示范效应和吸引力。此外，南亚等国，特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存在政治碎片化、人口年轻化等趋势，加之当地经济形势不佳、社会治理能力下降以及美国撤军所造成的力量真空等因素，都为“伊斯兰国”在当地加速扩张创造利好环境。目前，国际主流反恐机构已意识到恐怖主义在上述地区可能出现快速发展的现象，因此将东南亚等国卷入叙利亚及中东、北非乱局列为世界当前面临的9大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之一。

“伊斯兰国”东扩已初成体系

目前“伊斯兰国”在南亚、东南亚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条由宣传、招募、训练、派遣等各环节组成的扩张体系。

在宣传方面，除传统的向人群派发宣传资料外，“伊斯兰国”还特别针对这一地区青年人众多的特点，最大程度利用网络平台，通过“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以及移动互联通讯技术，将“圣战”思想和组织理念译成乌尔都语、普什图语、马来语等当地语言，进行最大范围的推送，直接对青年人形成“刺激”。同时鼓动已赴战区的“圣战者”，通过网络现身说法，以吸引更多本国青年加入。

在招募方面，“伊斯兰国”目前已在南亚、东南亚各国建立了招募网络，并将招募对象重点锁定为曾经参与过各种激进组织或者受“圣战”思想影响的人员。最新情况是，由于南亚等地区久历战火，因此“伊斯兰国”特别加强了对这一地区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专业型人才的招募，包括狙击手、炮手、战术指挥官、简易爆炸物制造者等。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尽可能地加强同当地武装组织间的联系，以期利用其在当地的网络和人脉加速扩张。目前，除塔利班等少数组织对“伊斯兰国”心存芥蒂外，包括南亚地区的“真主军”“自由战士组织”“简戈维军”以及东南亚的“东印度圣战者组织”“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组织”等，均已对“伊斯兰国”宣布效忠或支持，并积极为其网罗兵源、财源。



此外，“伊斯兰国”还在南亚等地区设立了恐怖训练营。据阿富汗等国政府反映，目前“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等地建立了多个武装训练营，范围遍及巴达赫尚省、昆都士省，参训武装分子规模已接近5000人。阿方担心，未来在阿“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规模可能超过其自身在叙、伊地区的战斗人员，成为最主要的兵源地。

为吸引当地“圣战者”赴叙参战，“伊斯兰国”除为其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和经济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诸如“马来群岛战斗小组”（KATIBAH NUSANTARA）等组织，将当地“圣战者”编入同一战斗序列，以解决其在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圣战者”存在的隔膜，更有效地投入战斗。

国际刑警组织等机构评估认为，随着这一扩张体系进一步完善，“伊斯兰国”从南亚、东南亚地区吸收的“圣战者”人数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成倍增长。

当地安全形势趋紧

“伊斯兰国”对南亚、东南亚的渗透将为当地安全形势带来深远影响，特别是当前已出现来自这一地区“圣战者”回流的趋势，引起了各国的高度警惕。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公开表示，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其实不是“伊斯兰国”组织，而是东南亚的“圣战者”西区的极端暴力思想、技术、战斗经验以及他们由此接触到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分析认为，“伊斯兰国”东扩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或将使当地恐怖主义思潮重现高峰期。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回归亚洲各国的“圣战者”为各自所在地区带回了极端“圣战”思想，致使恐怖主义在当地蔓延达到一个顶峰，出现了一批影响至今的恐怖组织。随后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压力下，南亚、东南亚恐怖主义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基地”组织影响力今非昔比，塔利班也开始考虑重归政治和解进程，而东南亚各地的恐怖组织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达成一致。而“伊斯兰国”的渗透，或将再次把恐怖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高峰期。二是回流“圣战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技巧，并与国际“圣战”网络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使当地恐怖组织更易获得国际恐怖组织支持的同时，也有可能将向极恐极暴方向发展。三是将引发当地各种矛盾更趋复杂化。“伊斯兰国”除将“圣战”思想带入南亚、东南亚地区外，还将教派冲突等问题引入当地，这将使本就面临较大安全压力的各国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

综上所述，当前“伊斯兰国”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尚属较为初级的阶段，但各国间应提前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避免其进入高速发展期。对“伊斯兰国”东扩的遏制，首先，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反“伊”力量及国际媒体仍将注意力集中在叙、伊地区，未对“伊斯兰国”东扩给予充分关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史蒂夫·瓦伦在不久前就曾表示，美国不相信“伊斯兰国”会在阿富汗等南亚国家有足够的市场。其次，各国应在应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去政治化。当前，在上述地区一些国家间，反恐问题存在被过度政治化的趋势，传统的“代理人战争”的观念并未被完全摒弃，利用反恐追求各自在其他方面的利益成为习惯，这必将对各国相互间反恐合作信心造成负面影响。最后，“伊斯兰国”已成为南亚、东南亚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地区性问题，因此国家间的合作机制亟待建立，以加强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对“伊斯兰国”的共同打击力度。

会议综述

推进全球治理 共享世界和平安全

——“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史小今

7月4日至5日，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承办的“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近170位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体系、国际安全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

国际“旧秩序”崩塌与“新秩序”重构

与会专家认为，二战以来世界曾一度处于西方的主导之下，而现在则已不再受西方的主导，国际安全体系发生了重大变迁与发展，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坍塌，新的国际秩序还在重构与演化。世界秩序正处于从绝对主导权模式过渡到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状态，无秩序、新秩序和世界重塑交织在一起，大国之间博弈加强，地区冲突、国际热点事件不断。全球正步入一个大融合的世界，这既符合中、美等世界大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中美应该在一些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加强合作，这将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有国际体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中国需积极参与构建，使世界各国共享安全，共享和平。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磨合，不是短期、离合式的，将是国际制度在21世纪的一个重大变迁。

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共享世界和平安全

在对当前重大国际安全难题及中国在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新角色的探讨中，与会专家认为，需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共享和平安全。当今全球安全治理的难度加大了，全球安全仍然受制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必须指出，新一轮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有着一定的中国背景，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要求中国在国际安全的制度层面进行相应的设计与谋划，以顺应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及中国崛起的现实。在区域和平安全中，中国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在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同时，积极与各方接触，包括同反对派接触，推动有关政府同反对派进行对话协商以解决问题。在亚洲整体发展上，最需要互相信任，尤其是日本和中国之间增进互信才能进一步建立起整个东亚共同体，覆盖更多的领域。

“海陆和合共建”的“一带一路”

在论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合作时，与会专家们指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实际上主要是为霸权服务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海陆和合”共建多元共存的国际关系体系。这种新的地缘政治价值理念有利于避免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战略对抗，有利于发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桥梁作用。“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这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是重要考验。而“一带一路”提出来的“包容、共同、共赢、发展”理念不仅保证了国内的安全，也维护了国际的安全秩序。

世界经济

改善中企在缅投资形象的举措

□ 张伟玉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些企业在各国的投资可以说风险与机遇并存。2011年，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单方面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中国投资的大型水电项目——密松水电站。2012年，中国在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抗议者占领了万宝公司在铜矿附近的营地，铜矿的建设工作被迫全部中断。直到此时，中国在缅甸投资面临的问题才引发更多更大的关注。而就在中国在缅大型投资频频遇挫之时，缅甸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和负面印象也有增大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中资企业的投资者和工作人员对缅甸民众的一些做法和行为也是叫苦不迭，颇多怨言。如此看来，双方互有责难、不满和诉求。

那么，何种措施可能建立与缅甸民众的良性互动，进而改善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形象？笔者基于中国在缅投资出现的问题和实地的观察、走访和访谈，认为以下几点必不可少。

增加投资透明度，更多倾听来自缅甸底层民众的声音和诉求。企业增加透明度能够降低“会带走他们什么”的恐惧心理。中资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不仅要在项目的有利的方面进行有力传达，最重要的是将有害方面也公开告知。全面传达所开展项目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十分重要。缅甸老百姓并非排斥中国的投资，而更看重的是缺乏权衡利弊和选择的机会。如果在投资前期的社会调研上更多地倾听民众的声音，达成一种互相认可的局面，那么在缅甸的投资将会在双赢的合作中顺畅许多。

加强宣传的力度和广度，推进缅甸民众信息获得渠道的建设。缅甸民众也并非对中国投资存在刻板的负面印象，而是缺乏获得客观信息和双向信息的渠道，中国媒体的声音缺失或传达不到位，更加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西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和中国声音的长期真空状态，使得缅甸老百姓缺乏获取双向的、客观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缅甸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私媒背后，或多或少拥有西方支持；缅甸的农村收音机频道更是不乏VOA、BBC等西方电台的“身影”。而在缅甸的纸媒和收音频道中，着实难觅中国和中国媒体的影响，就连缅甸年轻一代或知识分子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也是“脸书”（Facebook）“一统江湖”。

目前在缅中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确实努力开展了不少工作，他们也已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增强了宣传力度，但这仍然远远不够，真正要让当地老百姓熟知这些公益项目还需要加大力度和扩大范围。例如，笔者从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手册（2014）中获知，中石油东南亚管道公司截至2014年，在缅甸已完成的社会公益项目有111项，涉及医疗、教育、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仅笔者走访的若开邦皎漂镇就完成了24项，涉及6个医疗分站、16所中小学、2条公路。但笔者在皎漂镇中心的一位颇为熟知当地路况和情况的人力车司机的带路下，专门告知他想前往中国公司捐建的学校走访，但遗憾的是他将笔者带到了一所韩国捐建的高中和一所在圣约翰浸会教堂（St.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Church）内开办的幼儿园中，可见还需要再努力提升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公益项目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让当地老百姓熟知。

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公益项目时，不仅要在数量上，而更应该在诚意、质量和是否符合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上严格把关。企业应该真心诚意地帮助老百姓，而不是做表面工作。开展公益项目需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当然有力和有效的宣传必不可少）。企业所开展的每一个公益项目要实实在在使当地民众受惠，这样的公益项目才能被普遍喜爱和认可。

减小缅甸民众的相对被剥削感。缅甸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多经济困难，甚至一贫如洗，而中国投资人在缅甸的经济条件相对要好很多，这在缅甸人中显得比较“刺眼”，尤其是像曼德勒这样的华人和中国人聚集城市，其生活方式与缅甸当地人是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贫富差距悬殊，增强了缅甸人的心理落差，加强了其仇富心态和被剥削感。

要改善中资企业在缅投资形象任重而道远，需要几年甚至上十年的努力。除了上述措施外，中国还需要向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能力强国学习，加强人员往来和交流，尤其是加强缅甸民众对中国的实地了解。一位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2年，现为仰光大学一名讲师的年轻学者告诉笔者，一般的缅甸老百姓对中国其实并不了解，但是如果到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或留学过的缅甸人，通常都会非常喜欢中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感度会增加。不仅是她自己，与她一起在中国留学的缅甸同学也如此认为。因此，加强实地的交流和往来，不仅仅需要中国了解缅甸，更需要缅甸了解中国，做到双向沟通和互相理解，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做好民间交流工作，切实改善中国在缅投资环境，提升中国在缅形象。